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难点及其理论回应

肖 珺 胡文韬

摘要:新媒体跨文化传播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下一个前沿,作为信息传播技术的新媒体正在通过文化完成自身的转型,数字传播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带来时间、空间和结构作为权力的整体变迁,文化及文化间意义的生成与流动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其基本问题是诠释网络社会的文化间交往,数字化的信息技术范式扎根于不同的社会土壤推动新的文化秩序不断出现。其实践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间疏离与敌视加剧,一方面,互联网的大连接实质性地造成全球化的趋同效应,另一方面,在网络空间中,右翼民粹主义,种族歧视问题不断凸显;其二,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冲突呈现新表征,新媒体会便利跨文化沟通的效率,但不必然带来文化间的深层交流和理解,此外,网络传播的多元会话模式可能带来更多的冲突;其三,抗拒性认同带来难以缓解的文化间困境,全球传播同时成为推动和塑造认同危机的社会原因,同时,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读和抵制不断挑战传统社会权威。中国理论回应的着力点是建构与世界互动的跨文化共同体,以此开拓从中国出发,与世界互为方法的可能性。一是拓展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建构新媒体空间的全球倾听模式;二是直面文化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跨文化冲突空间内寻找协商和理解的路径。中国正在不断探索与世界沟通的理念和方法,中国文化自身的血脉中延续着具有世界价值的元素。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获取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流动的客观知识,更重要的是探索个人、政治、文化、区域(国家)等多维主体的形成过程。在文化背景异质时,对“他者”文化的地方知识进行语境化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和互相修正,使得全球文化是一种为了沟通的传播文化,最终结束对“他者”文化的先天恐惧,共享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关键词:新媒体跨文化传播;跨文化冲突与协商;跨文化共同体;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1-0107-11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XWB024)

学术研究中采用不同的话语表述我们与他者(others)的传播交往,如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他们彼此间存在语意的差别。跨文化传播基于人类文化的大关怀,强调文化间的交往。从这个意义上,对外传播等概念也是某种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但与更多地强调以我/我们为中心的传播交往观不同,跨文化传播始终在思考我们与他者如何互动,如何形成共有文化空间进行思想交流,进而彼此间达成理解的和谐之道。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ies,简称INMS)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下一个前沿,2012年第一本以此为主题的论文集在美国出版,该书主编Robert Shuter专门撰文指出:作为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新媒体正在通过文化完成自身的转型,但这种文化间接触导致的大变革却被传播学研究者忽略了,INMS就是要探索ICT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交汇点。^[1]INMS的研

究领域主要包括:一是新媒体文化,二是新媒体中的跨文化传播及其理论。学术发展的动因在于回应数字新媒体带来的文化变迁,人们不断创新数字媒体中的跨文化互动等社会实践方式,与此同时又会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思想观念和价值观,这些汇聚成为全球连通的结构重塑力量。可以说,数字传播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带来时间、空间和结构作为权力的整体变迁,跨文化传播在变迁中正在呈现区别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文化及文化间意义的生成与流动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

由此,新媒体跨文化传播成为当下全球传播的一种必然路径,同时也是可行路径。那么,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有哪些?包括中国实践在内,它有哪些实践难点?与此相应,理论建构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基于此,除中文文献外,本研究通过对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英文期刊自2013年至2018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人工检索,按照前文对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界定,选取高度相关的英文文献。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相关性归纳和比较分析,笔者将探究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实践难点与理论回应的可能路径。

一、网络社会的文化间交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使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和多样,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也因此拥有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活。他们从小通过网络了解日韩漫画,欣赏海外音乐,沉迷国外网剧,浸泡在各种电子游戏中,跨文化习得和文化间转换成为互联网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用户的文化生态。尽管民族主义不可能荡然无存,但却已出现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等不同阐释框架。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聚焦网络社会文化间交往的现象解释,逐步建构较为清楚的理论架构。

(一)从国家间层面看,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全世界的联系日益加强,全球视野成为相关研究的基本框架

有研究从“全球北方”以及“全球南方”的视角切入,指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尤其是 Twitter 等社会化媒体的接入使得全球南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反击”来自北方的霸权主义陈述的手段。全球权力结构的转移同历史、地缘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丧失交织在一起。来自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南方借助新媒体技术进行意义制造,从而影响、改变或取代占主导地位的北方的伦理框架。^[2]有研究者对来自67个国家的4708个在线新媒体中的媒体间(intermedia)议程设置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核心国家在制定国际新闻议程时的话语垄断被打破,(半)边缘国家(peripheral countries)的影响力进一步凸显。^[3]全球的媒体间传播不断促使跨文化传播游走于网络社会的纵横框架之间,比如新媒体技术自下而上地进行多元的民族意义建构,进而产生了一种“粉丝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其参与者在全球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将追星的方式平移至国家,将国家个人化,这被认为是一种极具网络亚文化风格的民族主义。^[4]网络社会中的互动主体复杂多样,民族国家、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等相互联系,与此同时,在流动中成长的地方和全球的公民既是民族国家的挑战者,又是民族国家的合作者。信息技术范式与资本力量密切交织,通过改变物质基础进而重塑我们的世界,并挑战传统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合法性。由此,文化自身的生长、文化间的交往和意义构成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二)从个体间层面看,数字媒体的使用总体而言大大拓展个人的交流空间、凸显个人主体性,跨文化交际将更加便利和频繁

新媒体会更好地实现社会多元化假说,优势群体使用互联网来加强现有的网络联系,弱势群体则使用互联网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来拓宽社会网络。^[5]其中,移动通信使用频率与社交网络的规模密切相关。^[6]社交网络规模的扩大又会增加跨文化交际量,并能显著影响跨文化交流主体的文化契

合度。有研究聚焦旅居者与美国人的社交互动,发现旅居者的心理模型随着互动的增加不断趋向于从人际网络中提取的美国人的共享心理模型,这种文化契合度的变化积极促进旅居者对东道国文化的认同和心理健康。^[7]有研究建构“文化偷窥者”(cultural voyeurism)^[8]这一新概念。“文化偷窥者”是指通过媒体镜头来观察和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行为和属性的个体或群体。这种“偷窥”过程跨越了在地的物理限制,“文化偷窥者”的行动更多基于个人兴趣和文化迷恋的驱动,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可以无处不在地轻松获取有关其他文化群体的信息来完成“偷窥”,从而对他文化实现透视并有可能产生同情,这使得人们能够设身处地地体验对方的感受、思想和情境,并有助于促进积极的跨种族互动,进而有助于跨文化理解。新媒体技术赋权使个人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凸显,人们通过连接不仅可以接触以往无法接触到的信息,而且反过来也为他们自己开辟了新的文化表达途径,他们得以对主流媒体中曾经描绘的他们的面孔、空间和文化做出反应。可以说,媒体对“他者”的建构和表征越来越多地被“他者”所验证和重构。数字媒体的互动性允许团体公开质疑他们的陈述,这显然是对新闻权威的挑战。^[9]有研究发现,拉美裔的领先地位、教育差距的逆转以及移动文化参与中城乡差距的消失表明,来自更广泛社会阶层的用户参与了移动文化活动,移动文化是让弱势社群成员更容易接触和负担得起参与文化活动的工具,这为弱势群体成员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文化参与场所。在面对面的文化交流频率下降的情况下,借助移动新媒体将有助于人们恢复文化参与。基于此,面对面文化参与和移动文化参与形成一种互补关系。^[10]除互补关系外,新媒体沟通帮助各类草根文化、弱势群体文化更好、更充分地发挥自身主体性,比如:为母亲们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表达自身生活经历的机会^[11],巴西黑人女孩以嘻哈音乐人、饶舌歌手的文化形象讲述她们边缘化的人生经历^[12]。媒体融合带来的跨文化共享、互动和创新建构了一片打破文化藩篱的新公共空间,特别对一些小众、弱势文化群体而言,他们希冀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更多的文化权利。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技术基础是数字化的信息技术范式,技术扎根于不同的社会土壤中会产生相似或者迥异的文化和文化间关系,这意味着新的文化秩序将不断出现。比如,粉丝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的边缘文化成为当下社会的主流文化;网络语言、互联网生活方式等逐渐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年轻人通过移动媒体反过来培育年长者,让他们学习和享受新兴文化生活等。对多种数字媒体的混合使用大大拓展了文化间言说、交流、适应和理解的可能性。正在到来的AI、类人脑等人工智能技术同样也会带来新的文化,甚至是一种新文化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工智能本身即是一次全球传播,技术完全有能力跨越文化语境,实现跨种族、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13]技术与社会的彼此影响和调适必然对文化间交往带来持续的改变,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时刻保持对人类变迁的敏感度,面向人际间、组织间、国家间,甚至人机互动间丰富且复杂的跨文化交往过程并予以揭示。

二、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实践难点

跨文化传播在新技术变量介入后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但却至今尚未建立新的理论范式。除却理论研究兴趣的个人原因外,新技术与社会变迁的迅速发展、理念裂变和政治经济形式的多元博弈都使得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面临异常复杂的局面。当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议题,如:探讨新媒体是如何促进全球文化权力的转移;个人主体性凸显对于跨文化参与的影响;全球媒体流动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分化等。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环境下,流动性的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一方面促使各类信息跨语言、跨种族、跨地域传播,甚至动摇了以固定时空为基础的民族国家间交往,文化的全球流动得以形成,不同背景的网络用户之间的了解与共情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全球文化消费模式的输出对于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沿袭等问题交错其中,冲突与协商在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时刻发生。当今,反全球化与新型全球化主张都迫切地需要跨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获得自身的落脚点和确定性。但是,文化间纷争却从未停下脚步。移民在全球范围内更快地迁移,难民在不同国家寻找自身的文化空间,国际间劳动力的频繁转移以及公司间的跨国合并,都使政治利益、经济市场卷入并加剧文化间问题。资本剥夺、国家竞争、阶层与族群分化、数字鸿沟的存在,都在提醒我们,横亘于地理和社会空间的区隔不仅不会轻易消失,反而有可能加深。^[14]网络社会中的跨文化冲突与认同危机将阻碍文化间的交流沟通。

(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间疏离与敌视加剧

新技术将跨文化传播置于开放的时空中,从而生成不同形态的文化认同,构成了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跨文化传播带来了更好的文化间尊重、理解和认同吗?

其一,互联网的大连接实质性地造成全球化的趋同效应。数字传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阻隔信息交流的时空距离,文化间交流的便利性大大增强,但也实质性地造成全球化的趋同效应。这一效应以牺牲文化差异性为前提,网络社会并未打破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均匀性,因为,这种“交融”往往不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在不平等条件下的“摩擦”和“碰撞”。^[15]当差异性和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知处于危险境地时,防御性反应就会产生,从而导致群体间冲突不断。在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在地经验和传统文化观念的消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数字鸿沟依然客观存在,数字不平等反映了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16]数字平台本身仍然反映社会的物质性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的交叉影响,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是话语与材料的交汇点,在一个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社会中,意义被反复表达,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形塑了重新想象物质世界的方式。因此,一方面,诸如 Instagram 这样的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构建自由的自我概念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它还是一个强大的中间人,维护着统治体系。^[17]互联网将塑造全球文化消费模式,并将席卷全球,^[18]很多人所面临的问题仍以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加以审视和强化。比如,贫民窟日益成为西方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在一个信息可以低成本生产和传播的时代,来自西方的游客通过拍摄视频或照片等在社交媒体上创造和分享他们体验贫困生活的经历,他们将当地人描绘为受益者并建构人道主义的自我形象,这显然强化了后人类主义时代知识的主观本质。^[19]

其二,有研究以媒介近用权(Access to the Media)为例,发现不同民族和族裔的人群虽然在媒介近用权上实现了自由,但这一保证社会成员接近和使用媒体、发表意见和观点的权利中却呈现越来越复杂化、隐蔽化和多样化的种族问题。^[20]互联网作为一种关于种族意义的政治斗争的第三空间场所,由于其互动性和匿名性为探索种族思维的话语功能提供了独特的机会。^[21]社交媒体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工具,尤其在右翼意识形态仇恨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煽动了大众宗教热情的火焰,刺激了暴力行动。有学者认为,通过用户/公民的情感参与,网络平台提供了将政治幻想具体化的新途径,数字社交媒体与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联系不仅是语境上的,而且是构成上的。^[22]网络民粹主义的群体希望能维持旧有的社会秩序,不愿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被遗忘或被压榨。尽管在面对面交流的背景下,公开的种族歧视变得相对不那么明显,但它在社交媒体上却找到了一席之地。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产生了复杂的大众种族主义社会动态,传统意义上的隐性价值观,如种族偏见和厌女症,人们在过去可能会为了避免争议不愿公开或者犹豫公开自己的立场,但现在由于廉价和匿名的互联网接入而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来,这将会极大地增加目标群体成员无意中接触到种族主义信息并受到其不利影响的可能性。^[23]与此同时,那些传统的社会主导文化,比如文化上的男子气概、统治意味浓烈的表达以及白人或中产阶级的优越感也有可能

获得社会奖励。^[24] YouTube 的相关研究表明,白人观点仍然最受欢迎,尽管社交媒体平台的去地域化特征为更公平的跨国流动提供了机会,但白人的种族逻辑占据强势地位。^[25]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也被认为具有右翼民粹主义品质,它虽声称是开放式社交媒体,但在这一空间里,后真相时代的民粹主义正在成为主流,右翼风格和策略正在变得流行或正常化,网络民粹主义者借用谩骂和愤怒产生了更多的追随者。^[26] 网络社区成员通过骚扰和评论轰炸等行动,使他们的信仰和身份得到确认。^[27]

(二)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冲突呈现新表征

跨文化传播与虚拟共同体能够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虚拟共同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跨文化传播是虚拟共同体形成及显现的路径。^[28] 在这些共同体中,既有可能形成和谐的认同,也有可能带来传播的分裂,如凯恩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曾预见,新媒体传播中网络集群的极端化更容易发生。既有研究呈现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中冲突的新表征。

其一,新媒体会便利跨文化沟通的效率,但不必然带来文化间的深层交流和理解。比如新媒体信息传播中,用户可以采用较容易被人理解的符号,从而促进跨文化传播和认同。但符号背后的文化又制约了人们的情绪表达。新媒体技术赋予人“无线过滤”的能力,网站也在以“协同过滤”的方式予以回应,新媒体平台上碎片化的内容不仅不能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还会引起新的文化冲突,形成所谓的防御性文化(defensive culture)。人们的网上讨论仅仅只是重复和强化各自不同的主张,彼此间并未形成真正的交流。这表明人们期盼的改善对话、解决冲突的对话前景在网络环境中也很难实现,基于沟通理性的信息获取也无法解决基于心灵归属的文化争端。因此,传播主体的地缘文化,语言等因素将显著影响全球文化流动。^[29] 即便是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人们也倾向于同自己态度观点一致的人进行交流。当代新媒体信息环境下,选择的丰富可以促进态度强化的螺旋式上升。个人寻找与自身态度一致的信息,反过来加强了先前的态度。^[30] 在与对立群体沟通时,人们使用语言加强群体认同,促进群体间的竞争。有研究表明,反讽在跨群体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反讽既可以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来攻击群体外的成员,也可以微妙地传达对群体内和群体外行为的期望。^[31]

其二,网络传播的多元会话模式可能带来更多的冲突。2004年,“多元会话”(polylogue)概念被首次提出,通常指参与会话的人数在两人以上的多方共同参与的对话互动方式,对话结构的转换充满不确定性,会话各方会因为意见分歧等产生冲突。网络聊天室、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都是多元会话的平台,网络用户会因为言语行为、对礼貌行为的预期偏离规范、话语策略等原因产生不同规模的冲突。一项关于 Youtube 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会形成大规模多元会话(massive polylogues),并会同步产生针对局部的、共时性的互动冲突,而现有的数字媒体环境尚难充分承担此类问题。^[32] 在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类似于反讽的情绪性表达更为普遍,说话人的行为和受话人的推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沟通不对称。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网络交流,这就要求人们了解在网络环境下自己是如何受到他人影响的。有研究指出,电脑中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即 CMC,例如在线论坛、博客、Facebook 和 Twitter)已经成为常规的交流方式,卷入其中的网络评论建立了社会规范,直接影响了读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表达偏见,此外,这些影响一旦脱机,就会泛化到参与者对目标群体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偏见态度上。^[33]

此外,青年人网络使用的习惯变迁还会导致一些新问题,比如社交网络使用中的隐私悖论。社交网站中凸显的隐私释放现象和由此导致的个人信息滥用,正在成为跨文化传播面临的难点。互联网上私人数据持久地不断累加,还会生成便于搜索的编辑条目,这会成为网络跨国犯罪,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犯罪的巨大隐患。

(三) 抗拒性认同带来难以缓解的文化间困境

数字媒体可以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新的机会,但线上的不平等、歧视和权力结构仍然存在,有可能

给那些社会地位低的人带来更大风险。数字空间中的尊重仍然植根于霸权规范所决定的价值观和价值假设中。^[34]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将认同的形式和起源划分为三类: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35],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跨文化间的互动更加高效和频繁,异质的网络主体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身份认同,认同的建构与解构几乎可以同时发生。文化通过其世界观和价值观准则发挥至关重要的心理功能,即为人类提供有助于缓冲焦虑的自尊和内心舒适感。但近年来种族与国家冲突日趋紧张,宗教激进主义运动激化,恐怖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那么,新技术既然开放了跨文化传播的时空关系,为何抗拒性认同却能一再筑起抵抗的战壕?这究竟是一种文化自主,还是人类文化共有空间的倒退呢?

其一,全球传播同时成为推动和塑造认同危机的社会原因。新技术的广泛普及加速了跨文化事件的全球传播,当今世界彼此互联,以至牵一发而动全身,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导致事件发生的因果之间几乎没有间隔。这一方面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但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暴力事件的发生概率也相应提高。对TED演讲的研究显示,作为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分享产品一方面“传播一切值得传播的创意”,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将精英主义政策话语以媒介化、大众化的方式纳入全球进程。虽然TED演讲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者,包括来自南半球的演讲者都能进入这一平台,但它又一次将一种通用的全球模式输出到多样的本地化背景中。当然,产品本身不必然具备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可观看者最终会利用从参与或观看这些演讲中获得的洞见来推动社会变革,比如在阿拉伯革命背景下的Twitter使用。^[36]由此可见,全球化传播并未实现文化间的融合,相反,网络社会中固有的权力结构反而强化了文化间的冲突和偏见,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新阻碍。

其二,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读和抵制不断挑战传统社会权威。在网络社会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处于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环境之中,媒体生产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他者”所接触。同时,新媒体技术的赋权使“他们”既能获取新闻报道,又能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在这一语境中的误读和抵制都对新闻权威造成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国家和权力机构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互联网上提供各种话语库。^[37]这表明,国家可以有效地使用新媒体生产新的“合法”话语并控制有争议的声音。不过,从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中国实践效果看,尽管我国媒体都在积极应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但总体而言,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不甚理想,被“污名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基于国家形象的认同危机仍未有效解决。^[38]

三、结论:中国建构与世界互动的跨文化共同体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作为对当下人类社会实践的回应,需要更多地从网络社会文化间交往中探查路径、规律和思想。中国倡导和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向世界传递了一种理念,即和平、合作、发展、共赢,通过借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等历史文化符号言说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价值诉求。这些新型全球化主张被认为是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自主创建式路径,中国自主构建新的运行规范和机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完善全球治理,进而实现“中式全球化”^[39]。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跨越地域、民族和国家,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人民,面对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文化要素,互联互通、民心相通就是要在不同的文化中实现跨越和共通。由此,中国理论回应的着力点是建构与世界互动的跨文化共同体,以此开拓从中国出发,与世界互为方法的可能性。

(一)拓展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建构新媒体空间的全球倾听模式

有研究指出与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共享信息对于跨团队合作至关重要,由信息交换带来的共情会提升群体成员同外界分享风险信息意愿。^[40]因此,全球虚拟团队应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共享

信息,促使合作深化。在地文化经验与虚拟空间交往形成一种边界模糊的多元文化互动可能性,不同文化的人通过情感交流体验互相尊重、自我检视和移情的跨文化传播过程,既保留原生文化的自我意识,也能对异文化的表层和深层文化充分了解和尊重,进而产生较为稳定的价值认同。为达到这一理想状态,亦可探索建构新媒体空间全球倾听模式的可能性。

陈国明和史达洛斯特提出了全球倾听模式(global listening model)^[41]认为,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会寻找一个平衡点(equilibrium),人们在交互信息中,会创造一个共属于双方的阐释意义。“倾听”是一个主动积极的过程,而不是对于已有信息的机械重复,也不是为了某个预设的目标而行动。这个模式提出,全球社会存在于一种可协商的语义空间(a negotiated semantic space)内,这种语义空间存在于现有的文化间(between)而不是在某个文化内(within)。新媒体真正实现了传播的互动性和多元性,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媒体内容在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的各个环节都更加灵活。新媒体为全球倾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相应也会对会话双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倾听的实现要求具备全球沟通能力,如全球性视野、足够的知识与技术、应对变动的弹性、敏锐与开放的能力等,通过尊重多元化不断促使人们相互理解,进而具备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意识和能力。只有当彼此采用倾听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流时,一种文化内的因素才有可能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之中。

(二)直面文化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跨文化冲突空间内寻找协商和理解的路径

在由全球多维度文化共存的媒介大都会(mediapolis)中,各类文化应该负责任地维护和管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空间,不同民族文化需要和平相处,而非敌对和误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表现为一种进步和普遍的概念,以纠正世界范围内的种族主义,而实际上它是以国家和西方为中心的。^[42]近年来,中国倡导和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向全球表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价值理念,将这些美好情感和愿景逐步提升至国际共识。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面临最为复杂和广泛的跨文化关系,在一些“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抗拒性文化表达也会出现在涂鸦、音乐等各种文化产品中,很多内容都是通过论坛、社交媒体等渠道辐射开来。由此,新媒体跨文化传播需要直面文化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我国应积极构建国际传播媒体伦理新秩序,在意识到文化交流中“同”的同时,也更加意识到文化间的“不同”,理性面对跨文化冲突并寻找协商和解决的路径。从整个跨文化传播过程看,人作为交往中的存在,是处于主体间关系的,我与他者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43]跨文化传播的理性不是单一主体的主体中心理性,而是多元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不同于主体意识哲学概念的单向性、绝对性以及排他性,这种交往的理性具有多向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理性更多地侧重互联网交往理性,这种共识包含着多样性与差异性。

此外,新技术也正在创造一些新的文化叙事,这些叙事可以呈现人类共同的愿景和诉求。比如,通过对媒体叙事中出现的非人类——超自然题材的研究发现,超自然叙事中非人类的反派角色会提醒人类,人类身份作为群体身份的重要性和可贵价值,由此,群体身份认同的共性就会增强,对少数群体的态度也会随之改善,这或许会成为减少偏见态度的一种可能机制^[44]。

(三)从中国出发,与世界互为方法:认知范式转移的可能性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的新实践,一方面,它难以摆脱传统社会的烙印,但另一方面,它有可能带来一种新文化或者既有文化的新语言、新形态。卡斯特在《传播力》一书中提出世界主义文化的构想,认为其将为民主的全球治理奠定基础,并将解决网络社会的中心文化制度问题。^[45]身份认同的跨文化协商和归属感的实践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学习和成长过程,它们是历史空间和思想空间中生命斗争的复杂而矛盾的辩证法。^[46]那么,这种世界主义文化的可能范式什么?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有可能产生与世界互动的新模式吗?

中国正在不断探索与世界沟通的理念和方法。从国家传播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一直以来都非常积极地在新媒体空间建设全球传播渠道,并通过制度设计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系统化的“大外宣”国家战略旨在加大通过网络空间塑造国家形象的力度,基本建立起了“1+6+N”(即一家旗舰媒体+6家央媒+其他部门)的立体化格局。^[47]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等新型全球化主张,使得跨文化传播正在成为中国的日常实践和经验,除了不断攀升的国家间交往,驻外企业、海外留学生、外国移民、境外旅游、网络文化产品等使得文化间互动成为传播常态。与此同时,网络作为物理属性的超国家传播空间,通过越来越开放,也是越来越细分的文化社群,让人类传播得以进入多重交叉的跨文化空间中,中国人的社交体验、意义认知和价值判断凸显出多元文化特质。

其实,中国文化自身的血脉延续具有世界价值的元素。杜维明在论及文明对话时,提出“21世纪儒学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儒学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地方知识。^[48]针对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理论,中国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推崇的不是宣传自己的教义、改变对方的信仰,而是通过对话实现“多样性的庆幸”(celebration of diversity)。此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竹内好、沟口雄三等日本左翼中国研究学者为代表,世界知识界也未中断“作为方法”的批判性东亚话语的生产和发展。在“作为方法”的方法论基础上,中国被视为“亚洲理论的未来”。2019年,单波、林莉基于新华社对外报道的历史考察,修正了“以中国作为方法”的结论,他们提出理性的对外报道是“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与目的”^[49]。一方面,全球化语境和多元化文化实践将有可能重建亚洲主体性的主张,另一方面,通过中国寻找走向世界之路。^[50]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跨文化传播有必要也有可能“探寻中国的方法”,探寻独特性背后的隐性密码和关系逻辑^[51],进而在跨文化传播实践和学术研究中从“中国”出发,在与世界的对话和互动中构建新型跨文化交往关系。

从“中国作为方法”到“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与目的”具有认知范式转移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获取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流动的客观知识,更重要的是探索个人、政治、文化、区域(国家)等多维主体的形成过程。当下的世界是全球化的多元现代化世界,中国只是其中一极。面对新媒体空间中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传播需要不断探索协商和理解的路径。在文化背景异质时,对“他者”文化的地方知识进行语境化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网络社会中,具有不同价值观、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以一种共享的、开放的传播观相互交流,不会因为跨文化交流同预期不匹配而产生的挫败感,彼此不仅可以共存,而且能互联和协同,在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和互相修正,使得全球文化是一种为了沟通的传播文化,最终结束对“他者”文化的先天恐惧,共享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 Robert Shuter.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ies: The Next Frontier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2, 41(3): 219-237.
- [2] Wasserman, H. Power. Meaning and Geopolitics; Ethics as an Entry Point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68(2): 441-451.
- [3] Guo Lei, C. J. Vargo. Global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A Big Data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67(4): 499-520.
- [4] 刘海龙. 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 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7, 4: 27-36.
- [5] Gonzales, L. Amy. Disadvantaged Minorities' Use of the Internet to Exp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7, 44(4): 467-486.

- [6] S. K. Lee, Katz, E. James. Bounded Solidarity Confirmed? How Korean Immigrants' Mobile Communication Configures Their Social Networks.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015, 20(2) :615-631.
- [7] Zhu Lin, Liu Meina, E. L. Fink. The Role of Person-Culture Fit in Chinese Students' Cultural Adju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 Galileo Mental Model Approach.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 42(3) :485-505.
- [8] Appiah Osei. Cultural Voyeurism: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Race, Ethnicity, and Mediated Intergroup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 68(2) :233-242.
- [9] Morris Nancy; Mendelson, Andrew L. National Geographic and Puerto Rico: A Case Study of Journalistic Authorit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e Digital Age.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6, 9(3) :458-476.
- [10] Chen Wenhong. A Moveable Feast: Do Mobile Media Technologies Mobilize or Normalize Cultural Particip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5, 41(1) :82-101.
- [11] Abetz Jenna, Moore Julia. "Welcome to the Mommy Wars, Ladies": Making Sense of the Ideology of Combative Mothering in Mommy Blogs.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8, 11(2) :265-281.
- [12] Gillam Reighan. Representing Black Girlhood in Brazil: Culture and Strategies of Empower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7, 10(4) :609-625.
- [13] 匡文波, 杨正. 人工智能塑造对外传播新范式——以抖音在海外的现象级传播为例. *对外传播*, 2018, 10: 11-13+38.
- [14] 张志华. "新地球村"的想象——赵月枝谈传播研究新实践. *国际新闻界*, 2016, 10: 54-67.
- [15] 赵月枝, 龚伟亮. 乡村主体性与农民文化自信: 乡村春晚的启示.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 2: 5-16.
- [16] Correa Teresa, Pavez Isabel. Digital Inclusion in Rural Areas: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Challenges Faced by People From Isolated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016, 21(3) :247-263.
- [17] E. B. Edwards, J. Esposito. Reading the Black Woman's Body Via Instagram Fame.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8, 11(3) :341-358.
- [18] H. Taneja, J. G. Webster. How Do Global Audiences Take Shape?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in Patterns of Web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66(1) :161-182.
- [19] Ekdale Brian, Tuwei David. Ironic Encounters: Posthumanitarian Storytelling in Slum Tourist Media.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6, 9(1) :49-67.
- [20] 姚建华. 传承与发展: 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新闻与写作*, 2019, 5: 52-56.
- [21] T. M. Pfafman, C. J. Carpenter, Tang Yong. The Politics of Racism: Constructions of African Immigrants in China on ChinaSMACK.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015, 8(4) :540-556.
- [22] Govil Nitin, Baishya Anirban Kapil. The Bully in the Pulpit: Autocracy, Digital Social Media, and Right-wing Populist Technoculture.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8, 11(1) :67-84.
- [23] Lee Won, J. Roselyn, Lee Ji Young, Song Hyunjin. "To the Bottle I Go... to Drain My Strain": Effects of Microblogged Racist Messages on Target Group Members' Intention to Drink Alcoho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7, 44(3) :388-415.
- [24] Elerding Carolyn. The Social Media Agon as Differencing Machine: A Materialist Feminist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8, 11(1) :162-178.
- [25] D. C. Oh, C. Oh. Vlogging White Privilege Abroad: Eat Your Kimchi's Eating and Spitting Out of the Korean Other on YouTube.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7, 10(4) :696-711.
- [26] J. Harsin. Post-Truth Populism: The French Anti-Gender Theory Movement and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8, 11(1) :35-52.
- [27] Blodgett Bridget, Salter Anastasia. Ghostbusters is For Boys: Understanding Geek Masculinity's Role in the Alt-right.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8, 11(1) :133-146.
- [28] 肖珺.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 连接、信任与认同. *学术研究*, 2016, 11: 42-48.
- [29] Verboord Marc, Brandellero Amanda. The Globalization of Popular Music, 1960-2010: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Music

- Flow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 45(4) : 603-627.
- [30] M. Wojcieszak, R. K. Garrett. Social Identity, Selective Exposure,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 How Priming National Identity Shapes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Via News Selec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 44(3) : 247-273.
- [31] Burgers Christian, Beukeboom Camiel J, Kelder Martinke. How Sports Fans Forge Intergroup Competition Through Language: The Case of Verbal Iron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5, 41(3) : 435-457.
- [32] Patricia Bou-Franch, Pilar Garcés-Conejos Blitvich. Conflict Management in Massive Polylogues: A Case Study from YouTub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4, 74(6) : 19-36.
- [33] Hsueh Mark, Yogeewaran Kumar, Malinen Sanna. "Leave Your Comment Below": Can Biased Online Comments Influence Our Own Prejudic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5, 41(4) : 557-576.
- [34] M. Pitcan, A. E. Marwick, D. Boyd. Performing a Vanilla Self: Respectability Politic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gital World.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018, 23(3) : 163-179.
- [35]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 曹荣湘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4.
- [36] T. Denskus, D. E. Esser. TED Talk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ans-Hegemonic Promise and Ritualistic Constrai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5, 25(2) : 166-187.
- [37] Lee Kyung. When Big Brother Uses Twitter, Too: Productive Forms of Policing and the Role of Media in the Seoul G20 Protests in South Korea.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015, 8(3) : 376-394.
- [38] 肖珺. 认同危机: 基于国家形象塑造的网络跨文化传播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3, 4: 114-119.
- [39] 贾文山, 王婧雯. 我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现状与构建路径. *国际新闻界*, 2017, 12: 6-21.
- [40] Liao Wang, McComas Katherine A, Yuan Y Connie. The Influence of Unrestricted Information Exchange on Willingness to Share Information With Outsider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 43(2) : 256-275.
- [41] W. J. Starosta, G. M. Chen. Intercultural Listening: Collected Reflections, Collated Refractions. *International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 2005, 28: 274-285.
- [42] Alsultany Evely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Islam in US Reality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6, 9(4) : 595-613.
- [43] 单波.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1: 103-113.
- [44] M. E. Ellithorpe, D. R. Ewoldsen, K. Porreca. Die, Foul Creature! How the Supernatural Genre Affects Attitudes Toward Outgroups Through Strength of Human Ident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 45(4) : 502-524.
- [45] 曼纽尔·卡斯特. 传播力. 汤景泰, 星辰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30.
- [46] Eguchi Shinsuke, Asante Godfried. Disidentifications Revisited: Queer(y)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6, 26(2) : 171-189.
- [47] 史安斌, 张耀钟.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改革开放40年外宣事业发展述评. *对外传播*, 2018, 12: 4-7.
- [48] 杜维明. 关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几点思考.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4: 101-108.
- [49] 单波, 林莉. 中国对外报道的“方法—目的”之感——基于新华社对外报道的历史考察.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 10: 36-41.
- [50] 曾军. “作为方法”的理论源流及其方法论启示. *电影艺术*, 2019, 2: 3-8.
- [51] 张涛甫. 作为方法的“中国”. *新闻大学*, 2017, 1: 3.

Challenges of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tudies

Xiao Jun, Hu Went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y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next leading edge in the field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new media, as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un-

dergoing its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ultu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society brings about a systematic change of time, space and the structure as power. Th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generation and flow of intercultural meanings, is more important to human society than ever before. The basic problem is to interpret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radigm is rooted in different social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appearance of new cultural orders. The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are mo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tercultural alienation and hostility around the world i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On the one hand, the extensive connection of the Internet has substantially caused the convergenc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right-wing populism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cyberspace. Secondly, the conflict in the intercultural virtual community presents new representations. New media wi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bring about deep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ultures. In addition, the polylogue mode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may bring more conflicts. Thirdly, resistance identity brings difficult intercultural predicament. Global communication is the reason for promoting and shaping identity crisis. Meanwhile, misunderstanding and resistan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stantly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of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key of China's theoretical response is to construct an intercultural community with the world. Thus, we can find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by China's method. The first is to enhance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value identific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virtual community, and to construct the global listening model in the new media space. The second is to face up to the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 and to find out a way of negot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intercultural conflict. China is constantly exploring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and the blood of Chinese culture contains elements of world values. China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as a method is not only to acquire objective knowledge flows through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new media, but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s, politics, culture, and regions (nations) and other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s. Whe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is differen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ontextualize the local knowledge of "other"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communication, mutual influence and mutual correction make global culture become a communicable culture, eventually terminate the innate fear of the "other" culture and enjoy a diverse world.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ies; intercultural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ty; China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as a method

■收稿日期:2020-10-22

■作者单位:肖珺,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胡文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刘金波